

序二

游俊豪

中国如此庞大繁复而恒常更替，所以任何对其某个单面进行单向的诠释，都势必将相关的话语与论述导入误区。无意的、有意的误读，极有可能对世界各国和各地社会产生震荡。二战后尤其如此，中国整体走出瓦解的危机，其国力逐渐升级变强，各国不得不认真衡量跟其关系，或拉远或靠近。而且，大量离散华人分布各国，他们的族群纽带与国族认同每每引发迷思，各国政府必须管治华族在国家结构当中的位置，或整合或融合。

鲁虎这部专书检阅地理上跟中国近距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论析了二战后20年间在地华人解读中国的各种尝试与角度，指出各种中国观的形成与传播带来了国家与族群认知方面的分野。

这份研究年份上限为1949年，下限1965年，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为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这过程当中，围绕着中国、中国性、华人性的诸多意象在折叠、分离着，如何被认知与接收非常重要。凭借另一新的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唤着境外的中国国族主义，涵盖面包括新马地区的离散华人。新马则脱离英国殖民主义而建立自己的国家，但两地对多元种族的排序各有相异的表述，政治终于走向分家。在国家与种族重组关系的时候，两地华人也在疏远着政治中国，并通过各种方式内化着中国文化、华人文化。

鲁虎的论著揭示，中国符号在许多管道中流动着。新马华人接到家乡故里的信函，读到中国出版的书刊，回到中国行旅与考察，收听中国电台的广播，借此拼凑中国图像。同时，新马的报刊、书籍、学校、社团、政党、政府也在筛选着中国的诸多信息。信息的

传播渠道与处理方式既然如此多元，中国观的建构当然产生差异。通过繁多的文本分析，并对一些走过那时代的人物采访，鲁虎归纳出中国观的三大面貌：新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崛起的亚洲大国。

“新中国”面貌，是离散华人里中国国族主义者的一道魅影，告别那传统封建而又兵荒马乱的中国，投奔新气象新希望的中国。“共产主义中国”符号，则有意识形态的分歧，左翼看待为“人民中国”，右翼、英殖民政府、马来亚政府却认为是“中国威胁”。“崛起的亚洲大国”坐标，在政治地理的视域里冲击强大，邻近各国必须重新调整区域的国际关系。

鲁虎来自中国，在新加坡求学教学多年。他的研究难得没有本质化有关中国的论述，而且对中国的多重象征与符旨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脉络合理而分明。尤有意思的是，鲁虎能埋首于故纸堆，触摸历史人物思想里的中国。陈祯禄、李光耀、陈六使、林连玉、李星可、林清祥、陈平，这些改变了历史也让历史左右的华人都再现于这本书里。鲁虎的研究揭示，这些重要人物如何认知中国种种，其实影响到新马族群政治的风潮、华文教育与文化的方向。另一特出的研究所得：马来亚致力磨灭中国烙印、新加坡容纳中国情结。

这部论著，在华人、中国、东南亚的重叠领域里，有其启示与解构意义。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副主任

2014年3月